

# 国家整合与乡村回应

## ——以1961—1965年统购统销制度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吴建征, 武力

[摘要] 统购统销制度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 曾面临“大跃进”时期的危境, 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失衡”的异动。而这种平衡的打破源于粮食问题和购销政策的嬗变。有鉴于此, 国家通过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多重调整, 实现了对危机的化解。而农民和乡村社会对此既有积极的互动, 又有消极的抵制。在这种博弈中, 虽未形成国家与农民在这一领域关系的根本良性互动, 但使该制度得以存续和深化。

[关键词] 整合回应; 统购统销; 经济体制

[作者简介] 吴建征,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 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 河北廊坊 065000;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09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8)02- 0101- 06

统购统销制度可以折射出乡村社会生动、复杂的历史面相, 洞悉其政策变革与乡村社会的多重回应, 可在一定视角透析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演进规律。近年来, 关于这一制度的历史考究愈发受到学界关注<sup>①</sup>。管见所及, 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对该制度的确立、实行、解体等过程进行梳理阐述或以某一区域为个案进行研究; 另一种则是将其与国家政策变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进行论证。但学界对统购统销介于“大跃进”和“文革”之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sup>②</sup>。事实上, 这一时期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面临着严重危机, 迫切需要在原有制度框架下进行转型与变革。诚然,

国家以该制度为实施载体, 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 并在二者的博弈互动中达到所谓的“暂时平衡”。但“大跃进”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弊端日益凸显, 迫切需要政策的调整来化解危境。笔者进一步发现, 在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 一方面,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的多重调整缓和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紧张关系, 暂时化解了粮食问题与购销危机; 另一方面, 农民和乡村社会对这种临时与局限的调整, 既有积极的互动, 又有消极的抵制。最终使该制度得以存续和深化。为此, 笔者在国家整合与乡村回应的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探究, 以期深化经济史与党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 河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三产融合视角下的供销合作社转型研究”(16457531);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整合与乡村变迁视角下的河北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1978)”(HB17LS001)

①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 罗平汉的《票证年代: 统购统销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年; 张学兵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解体过程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 2007年第3期; 武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年第5期; 徐勇的《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设极其成效——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 《中共党史研究》, 2008年第1期; 王瑞芳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 《安徽史学》, 2009年第4期; 葛玲的《统购统销体制的地方实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 2010年第4期; 李婉琨、曹树基的《粮食、市场与制度: 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第3期; 张金才的《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合作》,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5年第4期; 徐进的《一九五三年河北省粮食统购工作述论》, 《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第2期; 等等。

②目前所见主要成果的研究视角包括: 张学兵以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剥夺与改造为视角, 对这一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调整进行了微观实证研究; 冯志军重点分析了“大跃进”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巩固与强化。

## 一、源起：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失衡”

统购统销制度实施的基本“诱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尚处于经济恢复阶段，而工业化进程尤其是重工业建设成为当时国家在经济领域关注的重点，加之私营屯粮和1953年夏秋粮食危机等因素影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凸显。国家正是在此背景下基于经济发展的整体需要而采取了统购统销制度，并通过该制度整合乡村经济，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之中，因而，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统购统销制度衍生与发展演变的主要缘由。其中，国家整合与政策引导应视为主导性动力，从而实现国家对乡村流通体系的重塑，并使农副产品资料得到有效积累，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有力保证。诚然，这是国家基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推行的制度。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交集较少。正如著名历史社会学者黄宗智先生所言：国家与农民发生关系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地主士绅，而普通农民除在赋税、诉讼、案件等方面，几乎不与官府发生直接往来<sup>[1]</sup>。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而作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制度和乡村治理模式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高度垄断了乡村社会的生产与流通，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实现了对乡村流通领域的掌控。问题是，广大农民能够理解到何种程度呢？一方面，农民长期生活于较为封闭的乡土社会中，他们固守着传统的社会经济观念，因而尚处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心态下的中国农民，对于土地及其农产品的依赖性很强。毋庸置疑，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视为自身及家庭生存的重要来源，存在“有粮不慌”的心态。农民起初更多是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考虑，从而一时难以适应和接受。另一方面，某些地区在统购政策的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在政策的宣讲层面存在偏颇，甚至曲解了购粮制度，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甚至出现违法乱纪现象，从而引发乡村人际关系紧张与农民价值观念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关系上，一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二是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关系层面，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为完成或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在执行征购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太适合的方法。如1954年，“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人，竟将不合作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

就当场绑起来(绑了二人)”<sup>[2]</sup>，这样必然引起干群关系紧张，出现二者关系的不协调现象，群众对干部既害怕又抵制，干部则会受到群众的抱怨与孤立，从而不利于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在第二个关系层面，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便是贫农与中农之间的关系，中农中有部分余粮户。但在当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有些贫农对中农有余粮的“富足”深感不满，如河北省永清县某村的贫农说：“我村6个大资本家(大佃户)，不整他们能行吗？”<sup>[3]</sup>这便引发了群众间的矛盾，有些群众间的关系也出现了紧张现象。其实，这是由于我国粮食等物资处于紧缺状态，农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所引发的农村社会现象。此外，一些农民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在湖南省有农民曾说到：吃呀，吃呀，再过两天没粮啦。也有农民认为：共产党总是爱穷人，富的总不如穷的好<sup>[4]</sup>。我们知道，勤俭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许多农民都保持着勤劳质朴的作风。为何在统购统销制度实施后，一些农民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呢？依笔者分析，主要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制度本身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片面认为粮食被国家征购后，自己就没有粮食吃了，所以要“大吃大喝”；而认为共产党总是爱穷人的想法，则是没能够正确理解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实行的土地政策，误以为共产党总是爱穷人，没能够理解当时国家的困难。但这也与当时有些干部工作不当、宣传不到位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在该制度的实施进程中，其弊端已日益凸显。正如陈云所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sup>[4]</sup>而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大跃进”时期体现得甚为突出。

伴随着1953—1958年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与推动，虽然国家与农民在统购统销的制度框架下有所博弈，但农民正处于逐步适应和接受状态。然而，二者的运行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背景下共同引发了粮食紧缺与生产受挫的复杂局面。据载，1959—1961年的粮食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sup>[5]</sup>。在当时副食品极不发达的情形下，突如其来的粮食大幅减产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影 响不言自明，农村中产生了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再者，“高征购、浮夸风”也引发了农民的不满与抵制。据资料所载，1958年的粮食产量仅比1957年增产2.5%，却浮夸增产70%~80%，甚至翻一番，结果导致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由1957年的960.8亿斤上升到1175.2亿斤，比上年多征购了22.3%<sup>[6]</sup>。试想，在“浮夸风”的影响下，粮食与主要农产品的

<sup>①</sup>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天津专区办事处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任务的(草案)，1953。

产量在微幅增产的情形下被放大为大幅增产,那么,在农民需要拿出更多的粮食用于统购的情况下,自己还能剩下多少“口粮”?这势必加剧农民对该制度的不满与抵触情绪。此外,“大跃进”时期日益加剧的瞒产私分现象又是一重要诱因。毛泽东在1959年2月指出:“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sup>[7]</sup>为何出现上述现象?追本溯源,统购统销制度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掌控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购销权,制度施行伊始就存在国家与农民的博弈,衍生了乡村社会对统购统销制度的积极回应和消极抵制并存的局面,并趋向暂时平衡的状态。但到“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这种暂时平衡演变成失衡,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与运行面临着危机。

事实上,1959年陈云就指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sup>[8]</sup>。1960年4月,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全国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中提出: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sup>[9]</sup>。为进一步深入乡村社会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号召要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作为统购统销制度主要推动者之一的陈云到基层调研后,对农民讲道:“我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把你们搞得没饭吃,对不起乡亲们。”<sup>[10]</sup>那么,如何解决统购统销制度出现的危机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粮食的征购问题。一方面,国家多征购粮食能够保证统销和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原料,但留给农民的粮食数量必然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农民留存的粮食数量多,则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必须减少。回溯到1953—1958年间,农民有效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进程,虽然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较多,但总体上尚可处于勉强维持状态。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则明显到了不可维持的状态。为此,陈云提出:农产品的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宁可少购一些,给农民多留一些<sup>[11]</sup>。李先念进一步认为:在纠正征购“过头粮”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才是解决粮食短缺的根本大计<sup>[12]</sup>。这样,国家减少征购粮食数量和增加粮食产量并行的调整思路已然初步形成。

## 二、整合:策略调整与危机的化解

前文已然提及,国家提出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调整,正是基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所面临的

粮食问题和统购统销实施危机,调整是国家与农民的双重需要。但调整的基本思路给我们透露出两点:第一,调整不是不施行统购统销制度,而是在坚持这一制度的前提下,以化解危机为主要指向的改革;第二,调整的具体举措主要围绕国家减少粮食征购数量和增产来进行,而在化解危机的调整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向前追溯,早在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便提出了“大仁政”思想,即要以增加农业税的方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并以在延安时期多征公粮支援抗战为例证进行了论断<sup>[13]</sup>。毛泽东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论断虽未直接指出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但毋庸置疑的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导向,为统购统销制度的确立与运行奠定了政治基调。也正因为如此,统购统销制度并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一项制度,而是被提升到支援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略需要的高度,其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必然要运用国家整合的因素。国家在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对该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对购销结构的重新定位(即实行“少购少销”的原则)。而这一改革又体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型调整与整合,最终目的是为了化解危机。正如李先念所说:“少购少销是在克服粮食困难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条积极方针,今后应当继续贯彻执行。”<sup>[14]</sup>少购少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掌握呢?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少购相对于高征购而言,并不是指征购越少越好,而是要控制在合理的征购范围和比例上;少销是指在征购数量减少的前提下需要压缩销售,但少销的领域和范围要合理确定。二是少购少销在数量上处于动态趋势,即根据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和发展态势而定,依据产量的多寡合理确定购销数量,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少购少销。事实上,1963年下半年随着粮食情况的好转,国家少购少销的政策则转为多购少销或只购不销。而农民的另一种顾虑则是以往存在“购粮无底、增产无益”的看法,正如有的农民在统购统销政策初期所说:“干什么啊?还不如不干的,你干的多,将来卖的多。不干的不用卖粮,多省事儿。”<sup>①</sup>也有群众反映:国家把需要的粮食数量固定下来,就算任务大些也能同意,心里明白,没有顾虑<sup>②</sup>。那么,是否有必要把粮食征购的数量和品种长时期固定下来呢?依笔者分析,长期固定下来存在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

①“关于试点乡工作情况的报告”,1954。

②“1963年度粮食、油料包购任务情况的说明”,1963。

积极性,他们明确知晓国家的征购数量后,若想获得更多的剩余粮食资源,则势必积极生产,从而有利于提高国家总体粮食产量。但另一方面,长期固定下来使国家无法根据不同年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而农民也存在丰年和荒年收成差异等问题,并不适宜长期固定。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为此,李先念在1962年呈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总原则下,把征购任务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sup>[15]</sup>。这一思路即是综合考虑“固定”正反两方面的效应而提出的兼顾策略。随后,国家出台了“一定三年”的规定,提出:“从1965年开始,对生产队的粮食征购基数稳定下来,三年定一次,一定管三年,三年内不再变动。”<sup>[16]</sup>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三年内征购的基数就成为一个固化的数字呢?若是如此,则显然没有考虑农民也存在丰年和荒年收成差异的问题。事实上,“一定三年”存在变与不变两方面的内涵。所谓不变是指在正常年景下确定的基数不变;而变则是根据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实际产量,丰年则在不变的基数上适当多购,欠收则适当调减当年任务,即“定中有不定,不变中有变”。

这样,国家为解决粮食问题和化解统购统销危机,在政策层面从大购大销转变为少购少销,从高征购转变为合理基数下的“一定三年”,从而形成了新的购销结构,对乡村经济尤其是流通领域进行了重新整合,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这一层面购销政策的调整并未涵盖市场因素。那么,价格与市场因素又有哪些调整呢?

我们知道,国家以统购统销制度为载体,一方面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另一方面则在城市中对工商业用粮和城市居民供应领域进行统一的计划供应,并逐步封闭“自由市场”,禁止私营商业的收购活动。这样,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几乎占领了整个粮食市场,通过掌控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环节,进而控制流通体系,从而封闭了“自由市场”,形成了国家的垄断经营。因而,随着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农村自由市场呈现日益萎缩的趋势。正如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先生所言:“一是农副产品短缺引发国家对农副产品实施统购统销,使农村自由市场商品急剧减少;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推进,而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自由市场主体日渐式微。”<sup>[17]</sup>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农村自由市场曾经短暂开放,但不久便处于近乎关闭状态。在经历了“大跃

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后,国家对粮食市场适当放开。1962年的《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提出:“国家开始向已完成征购任务而仍有余粮的生产队下达议购任务,同时收购落市粮,鼓励粮食上市。”<sup>[18]</sup>诚然,粮食市场的适当放开作为一种补充型政策,其初衷是为了改变商业流通领域体制过于僵化、弥补统购统销制度缺陷等问题,但这种放开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必须是在坚持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下的适当放开,放开的范围和农产品种类都有限制;第二,开放市场的成交价格并不是完全按照价值规律,而是采取议购议销制度。但这毕竟在统购统销的制度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为市场化的运行模式积累了经验。

谈及这一时期统购统销政策的调整,价格机制值得我们关注。价格因素直接反映了国家、农民与消费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在1961—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粮价包括统购、统销、调拨、议价4种价格,其中如何厘定统购价格应视为价格的核心问题。而统购统销制度下的“剪刀差”效应,使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一直处于相对较低价格。经过1958—1962年的2次部分提价和1次全国提价后,粮食收购价格累计提高35%。并到1963年9月起实现了购销同价<sup>[19]</sup>。笔者认为,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购销价格并实现购销同价,促成了两方面效果: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剪刀差”效应,适当缩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产粮区与经济作物区之间的差距;二是购销同价与适当开放粮食市场共同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对解决粮食问题与统购统销危机显然是具有正向效应的。

### 三、回应:积极的互动与消极的抵制

诚然,国家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适时调整,具有务实性特征,从而形成了新的购销结构和价格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粮食自由市场。一方面,缓解了粮食与统购统销危机,使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从而实现了国家对乡村流通的再次整合;但另一方面,这种调整政策也具有临时性和局限性的特征,并未从根本上形成良性互动。因而,农民和乡村社会对政策调整呈现出积极回应与消极抵制并存的局面。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粮食形势堪忧,而经过这一阶段的适时调整,粮食生产形势出现了显著好转。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好转呢?笔者认为,这要从全国总人口、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三

组数据来进行综合分析, 以下为笔者整合相关资料 所得数据(表 1)<sup>①</sup>。

表 1 1959—1965 年全国总人口、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

年度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总人口数(万人)	67207	66207	65869	67295	69172	70499	72538
粮食总产量(万吨)	16968	14385	13650	15441	17000	18750	19453
人均占有量(公斤)	252.5	217.3	207.3	229.5	245.8	266.0	268.2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 从 1959—1961 年,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1961—1965 年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 1961 年为分水岭, 正是国家对统购统销政策调整的酝酿和初期运行阶段。而粮食产量的提升则为征购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前文已然提及, 调整期的少购少销政策在粮食好转的态势下转化为多购少销或只购不销, “一定三年”仅为征购基数的固定。那么, 1962—1965 年粮食收购究竟呈现怎样的走向呢? 是上升趋势、下降趋势还是波浪式形态? 据资料所载, 1962—1965 年, 我国的粮食收购量从 1962 年的 3815.4 万吨提高到 1965 年的 4868.5 万吨, 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征购数量占总产量的比例稳定在 23%~26% 之间, 净收购占总产量的 17% 左右<sup>[20]</sup>。由此可见, 粮食形势确实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 这也是农民和乡村社会对统购统销政策调整的积极回应。

我们知道,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与粮食领域的高征购使农民和乡村社会遭受重创, 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也处于消沉状态。正如陈云所说: “政策问题不解决, 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其他的措施再多, 农业生产也上不去。”<sup>[21]</sup>诚然, 这一时期政策的调整虽然仍是在统购统销的框架体系下, 但已经摒弃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购大销, 征购数量处于相对平稳状态。这样, 农民可通过积极发展生产后产出余粮, 而粮食市场的适当开放, 又为农民售卖余粮和增加收入提供了空间与土壤, 进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动。依笔者愚见,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核心点在于土地问题, 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土地所产出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应视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焦点。由此, 通过政策的调整、粮食的征购和一定程度市场化运行的新政策, 起到了缓和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正向效应。

但粮食问题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呢? 从理论层面讲, 提高粮食产量与提升粮食商品化程度都是解

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当时是否可行呢? 一方面, 我国的农村经济结构是传统的小农经济, 农业生产明显不足, 而受前期“大跃进”“浮夸风”等政治气候影响, 许多地方往往重统购统销而忽视生产, 致使一些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呈现一定程度的恶化。进入调整期后也仅是化解了危机, 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搭建了一个暂时平衡点, 但这一时期农村的生产力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又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粮食市场的适当放开也仅作为统购统销制度下的一种补充型政策, 放开的范围和农产品种类都有严格限制, 开放市场的成交价格并不是完全按照价值规律, 而是采取议购议销制度。这与粮食商品化程度的要求相差甚远, 自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这正如薄一波晚年所指: “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 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sup>[22]</sup>事实上, 粮食产量从 1962—1965 年虽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但仍然不容乐观, 以下是笔者整合相关资料所得数据<sup>[23]</sup>。

表 2 1956—1958 年与 1965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的对比

年度	1956	1957	1958	1965
粮食总产量(万吨)	19275	19505	19765	19453
人均占有量(公斤)	307.0	301.7	299.5	268.2

由表 2 可知, 即使到了调整期粮食产量最高的 1965 年, 粮食总产量依然未达到 1958 年的生产水平。从人均占有量来看, 1965 年均低于 1956—1958 年的水平。即便以人均占有量最高的 1956 年来分析, 若排除出口粮、饲料粮、种子粮以及家庭副业原料等因素, 假定人均年消费 614 斤原粮, 依然是很低的消费标准。

有学者认为: “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质是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的支配绝对国家化。”<sup>[24]</sup>但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统购统销仅是从理论或者

<sup>①</sup>笔者依据以下参考资料中的数据整合而成: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 第 156 页; 农业部计划司编: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89 年, 第 9 页。

说是在制度层面试图达到这一状态,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显然存在“漏报”“瞒报”等多重现象,更不能忽视到基层延伸后的落实效果问题。而农民作为统购统销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虽然国家对缺粮者进行适当返销与补贴,但农民往往会从自身意愿出发,向往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对农民和乡村社会而言,虽然这一时期的粮食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的调整,但在统购统销的制度框架下,农民对粮食依然只有收打与管理职责,而并无分配之权,更无粮食的定价权。而“瞒产私分”则成为农民与乡村社会对统购统销抵制的一种普遍现象。笔者所析,这一时期“瞒产私分”现象加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统购统销的制度框架下,农民扩大自身利益的一种普遍行为,这种现象贯穿于该制度的始终;另一方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在当时应视为稀缺的物质资源,而“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给农民留下的“伤痕”尚未完全愈合。

因而,1961—1965年对该制度的政策调整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并未因政策调整而销声匿迹。我们知道,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需要农村完成国家既定目标的生产任务,其范围涉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是为了重构农村经济流通体系。这种流通体系的重构使国家意志贯彻到乡村社会,而农民和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这一时期频繁的政策调整虽然化解了粮食和统购统销危机,却对一部分农民的心理造成冲击。如“一定三年”的政策丰年是在不变的基数上适当多购,欠收则适当调减当年任务,但“基数”的固定引发了两种明显效应。如有粮食欠收农民提到:“粮食政策调整的不合理,有的队富的淌油,有的队累得流汗,按比例交粮是脱离实际。”<sup>①</sup>而有的生产队粮食丰收,则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多分多吃<sup>[25]</sup>。少购少销,适当放开粮食市场、议价制度等政策的调整,也仅是在统购统销的制度框架下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性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与农民在这一制度下的博弈和冲突。这就说明政策的调整并未使国家与农民形成根本良性互动,只是在当时的阶段化解了统购统销危机,使该制度得以延续与运行。

统购统销制度在这一时期的调整与运行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使粮食问题和统购统销危机得到暂时性与临时性

解决。但从整个集体化时期来看,国家一直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主导者,并通过政策的调整而不断改变着乡村社会经济形态;而农民和乡村社会则是在被动接受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呈现积极回应与消极抵制并存的双向行为。在这种多重形态的互动过程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博弈中不断处于“失衡”与“平衡”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最终使统购统销制度得以存续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182.
- [2]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292.
- [3]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1949—1957年湖南醴陵县为个案[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28.
- [4][19]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1,167.
- [5][16][18]赵发生.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6,139,136.
- [6]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331.
-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
- [8][10][11][2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5,146,155,152.
- [9]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李先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06.
- [12][15]《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1949—199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87,553.
-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4—105.
- [1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粮食志[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67.
- [17]吴承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395.
- [20]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7.
-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89.
- [2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7.
- [24]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设及其成效——统购统销与瞒产私分[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 [25]王耕宇,等.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上[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123.

[责任编辑:邵 卿]

<sup>①</sup>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天津专区办事处关于1964年工作总结和1965年工作任务的(草案),1965。